

“人民性”：一个多语际传播的近代概念 “Renminxing”: a Modern Concept with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李 冬松

Li Dongsong

内容提要：“人民性”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在《辞海》、《辞源》等辞书中却缺少这个词条。考诸历史，“人民性”一词在汉语中的首见书证是苏凡1941年1月的翻译文章。根据戈宝权的回忆，苏凡最早将俄语“Narodnosti”译成了“人民性”，此前汉语中是用日语借词“国民性”“民族性”等来表达这个概念的。俄语中的“Narodnosti”或“народности”则源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的“nationality（法 nationalité 德 nationalität）”，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概念。日语借词“国民性”“民族性”带有超阶级的语义特征，而“人民性”则带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内涵。

绪言

在现代汉语中，“人民性”曾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关于党性与人民性问题的激烈争论；有人以反思“文革”为由，认为“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主张用人民性来制衡、制约党性。为此，胡乔木认为，“人民性”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建议不要再用这个提法。甚至在本世纪初，仍有学者主张应当摒弃“人民性”概念。时过境迁，如今“人民性”越来越成为一个高频词汇，截止到目前，百度搜索中有53400000条之多^①。在中国知网中，有1521篇题目中包含“人民性”这个概念的研究论文^②。近年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用到了“人民性”这个概念，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 and 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2021年11月，“人民性”首次出现于官方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③。显而易见，“人民性”已成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个词在多数各类大中小型综合或专业词典中都不存在，包括《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以及《中国哲学大辞典》、《近现代辞源》、《近现代汉语辞源》等^④。在载有这个词条的极少数词典中，也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简短释义，而没有涉及这个词的溯源。例如，《现代汉语辞海》中这样解释：“文艺作品中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的反映。”《现代汉语大词典》则解释为：“指文艺作品中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的反映。”

《中华大辞林》的词条释义是：“(大陆) 文艺作品中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的反映。”那么，“人民性”这个概念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它的词源及原始词义又是什么？它在中国语境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语义变迁？这些疑问使笔者产生了对它进行考证的念头。

一、“人民性”在现代汉语中的首见书证

关于“人民性”在汉语中的出现，尹韵公、丰纯高认为是1944年《中苏文化》专号刊登的《文艺论争中的几个教训》这篇译文，其中反映了苏联文艺界就人民性问题的争论，人民性这个术语从此就传入中国。但是，笔者通过检索《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及《中共党史期刊数据库（-1949）》，并没有发现尹、丰文中提到的这篇文章，尹、丰引文可能存在错误。不过，笔者发现比尹、丰提到的1944年更早的1941年1月，《中苏文化》（文艺特刊）中的《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之诸问题》一文中，就大量使用了“人民性”这个概念词：“马洛的戏曲在大量的英国观众中被通俗化了。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马洛的戏曲无论是按照他的伟大说，无论是按照他的偏见说，都是人民的戏曲。但马洛的戏曲仅在不久的时期里保存了这种人民性（Nationality），现在马洛的戏曲仅有狭隘的专门家对它表示一点兴趣。……假如歌德容许了催眠自己‘人民性’的意识，那末在人民性中进步的意识必然和反动的意识，阻碍进步运动的意识相混和的，他就会在那种‘人民性’的名义下，保存着仇视人民的意识，成了仇视科学的人民性。那时，‘浮士德’就不会是人民的了。……托尔斯泰的人民性是存在于他的反对沙皇，反对剥削阶级的激烈抗议中。而他的这种人民性到这时还在人民的心中燃烧着，反抗强力和反抗压迫的火焰，而且是永远如此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译文中也注明了“人民性”的词源，即英语“nationality”这个词。另外，在同期文章中，还有一篇署名魏辛，译自《红色处女地月刊》的译文《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之真相一论〈文艺批评家〉杂志的有害观点一》这篇文章中也使用了“人民性”这个词：“‘文艺批评家’集团在反对庸俗社会学单纯化的旗帜下引申了自己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文学史和艺术史是站在阶级斗争之外的。‘文艺批评家’集团用‘人民’和‘人民性’（即‘通俗性’）等的抽象概念来代替过去历史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这里看出，魏辛把“人民性”和“通俗性”当作同义词来对待，他在这篇文章中只用了一次“人民性”，而更多地使用了“通俗性”这个词：“曲解世界观与艺术创作之间所存在的实际联系使‘潮流派’代表们对于艺术中的通俗性问题作出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说明。V. 克门诺夫在‘苏联艺术’中证明：‘伟大作家艺术中的通俗性，不仅反映人民的理性，而且反映他们的感觉’。列宁把文学及艺术的通俗性直接与先进的世界观，与先进的理论联系起来：‘只有以先进理论作指南的党，才能完成先进战士的作用……’。”从以上两文可以看出，“人民性”这个词在上世纪40年代出现了普及的迹象，但也存在着与“通俗性”混用的情况。

那么，“人民性”这个概念词是何人何时翻译出来的呢？关于这一点，戈宝权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译本序言中有所披露：“过去苏凡同志曾将这个名词译为‘人民性’，我和几位朋友

谈过，也主张‘人民性’一名词较为确当，所以现在就沿用这个译名了。”戈宝权这里提到的苏凡正是上文《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之诸问题》一文同名同姓译者，应为同一个人。实际上，苏凡原名郁文哉，江苏江阴人，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苏文化》杂志编辑、主编，《戏剧月报》编辑（与陈白尘、曹禺等合编），1949年后任《人民日报》副刊《苏联研究》编辑。戈宝权的译本出版于1947年，“过去苏凡同志曾将这个名词译为‘人民性’”这句话与苏凡1941年1月的这篇文章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但苏凡是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译名呢？即他在此之前的文章中是否使用过“人民性”这个译名呢？为此，笔者查阅了苏凡1941之前发表在《新演剧》及《中苏文化》上的几篇相关译文：其一是1940年6月10日发表在《新演剧》上的《论现阶段的苏联剧本创作》；其二是1940年6月18日发表在《中苏文化》第6卷第5期上的《高尔基：政治家》；其三是1940年10月10日发表在《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上的《论现阶段的苏联剧本创作》；其四是1940年11月7日发表在《中日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上的《苏联的新社会与新文艺：苏联电影中的十月主题》。苏凡在上述几篇译文中，都没有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词。因此，他的《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之诸问题》这篇译文很可能就是“人民性”这个概念词的最早书证，而苏凡则成为了“人民性”译词的发明人。作为佐证，上述使用了一次“人民性”这个概念词的《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之真相》这篇文章的译者魏辛在1940年11月7日的《中日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中还参与发表了《蘇聯的新社會與新文藝：蘇聯社會主義的文學及其最近的文藝論爭》这篇译文，其中写道：“农民革命的观念不仅是那时最进步的观念，而且是唯一的革命观念和最广大的解放观念，俄罗斯还没有无产阶级，还没有毁灭那种制度的能力，而车尔纳雪夫斯基已希望它的破灭了。在这里渐渐地包含了车尔纳雪夫斯基的国民性和人道主义。而‘潮流派’洗濯去了国民性的和入道主义的具体内容，得出了不合理的结论。广大的和进步的观念变成了‘狭隘的’观念。”“这就是对于民众性的超阶级的瞭解所要获得的结果。这就是对于民众性的庸俗瞭解必然的趋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被一般的民众性的超阶级理论代替了。这般人忘记了有社会主义的民众性，有资产阶级的，中世纪的，与古代社会的民众性。这般人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民众性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众性不同的。对于每一个时代，每一国家的民众性没有一种具体的分析，对于民众的进步运动发展的各阶段若缺乏具体的分析，那末对于文学的民众性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认识。”在魏辛等人的这篇合作译文中，既使用了“国民性”这个概念词，也是用了“民众性”这个概念词，而这两个词都曾作为“nationality”的译词。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同一个外来概念（nationality）的不同译词，说明了新译词的不稳定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性”这个译词的产生背景。苏凡首次使用“人民性”的这篇译文发表于1941年1月1日，他完成翻译应该是在1940年末，这与魏辛等人合译的这篇译文在时间上刚好是重合的。因此，“人民性”这个概念词的酝酿、产生当在1940年下半年，而公布于众是在1941年1月1日。

另外，对于“人民性”的首例书证，还有一个容易踩中的误区，那就是《胡风文集》的“人民性”用例。其中载有胡风1939年7月发表在《七月》上的一篇文章《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对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其中写道：“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那从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形势这一个视角看来，就更加明显了。要得到人民性，伟大的古典艺术所昭示我们的这个轨范，须得艺术家对于民族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对于民众生活有深入的感受，对于民众的语言、民众的表现生活或思想感情的文艺形式（如口头文艺或民间文艺）有丰富的积蓄，因为，艺术力的人民性和思想力的人民性，原是一个内容的两面，而人民性却是以现实性为生命的。”在这段文字里，胡风5次使用了“人民性”这个概念词，时间上早于上文苏凡1941年的用例。但是，笔者查阅了胡风最早发表在1939年7月《七月》上的这篇文章，上述5次“人民性”用例在原文中都是“大众性”。1939年8月16日，胡风还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改进》（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上，上述5次“人民性”用例同样是以“大众性”行文的。那么，胡风是何时用“人民性”替换了文中的“大众性”的呢？《胡风集·出版前言》中在谈到这篇文章出处时提到：“《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1943年由桂林南天出版社出版，但遭到了书报审查部门的严重删改；1950年，尽可能地复原后，改名为《剑·文艺·人民》，由上海泥土社重排出版。”笔者没有查阅到1943版的《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但查阅到了1945年1月的重庆南天出版社版本及1946年4月的上海希望社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原文中的“大众性”依然如故，没有改为“人民性”。而在1953年4月上海泥土社第三版（1950年10月初版）的《剑·文艺·人民》中，上述“大众性”全部改为了“人民性”。由此看来，胡风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词远远晚于苏凡1941年的用例；他最初使用的“大众性”与魏辛等人译文中的“民众性”、“国民性”都是源自nationality这个同一的外来概念。

二、“人民性”概念的起源及语义演变

尹韵公、丰纯高曾经指出：“人民性”这个概念来自俄罗斯文学史及文艺理论，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沙皇俄国；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是维亚捷姆斯基，他在1819年给屠格涅夫的信里以及1824年写的《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谈话》一文中，使用了“人民性”这个概念，当时的“人民性”即是民族性。按照尹、丰的观点来理解，维亚捷姆斯基应是“人民性”这个概念的发明人。既然如此，那么，维亚捷姆斯基所用的“人民性”概念对应于俄语中的哪个词呢？尹、丰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文艺理论家顾尔希坦则指出：“在我们国家里，第一个尖锐地提出艺术中的人民性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卓越的俄国启蒙学者——拉地谢夫。”请注意，顾尔希坦只是说拉地谢夫最早提出了艺术“人民性”中的问题，并不是说“人民性”这个概念是拉地谢夫最早使用的。实际上，上世纪40年代，戈宝权曾在翻译顾尔希坦的《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人民性’这个名词在俄文中是Narodnosti，系自‘人民’（Narod）一字而来。这个名词在字典中又有国风、国民性、民风、人民主义等解释；在已有的中文译名中，则有人译为‘通俗性’和‘民族性’，但原意具不能确切吻合。”在这里，戈宝权也只是说俄语“Narodnosti”是“人民性”的对应词，没说是词源；而且，“国民性”“民

族性”又都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国民性”早在1903年就已经被梁启勋借用到汉语中了^⑥。在俄语中，“Narodnosti”与“народности”具有互释的关系，二者都对应于英语“nationalities”，而英语“nationalities”是英语“nationality”的复数形式；俄语“narodnost”是“Narodnosti”的单数形式，“народность”则是“народности”的单数形式，“народность”对应于英语“nationality”（法 nationalité 德 nationalität）；俄语“Narod”与“народ”互释，且对应于英语“people”或“nation”这两个词。其实，上文提到的汉语“人民性”首见书证《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之诸问题》（1941年1月）这篇译自俄语的文章中所注明的“人民性”对应词英语nationality 当是复制俄语原文，也等于是告诉我们英语nationality 才是“人民性”的词源。

能够佐证上述推断的是高尔基。高尔基曾在其1908-1909年所著的《俄国文学史》中说：“讲到我们的浪漫主义，在俄国，他一旦发生便立刻助长了‘人民性’这个模糊概念的发展和巩固——这个概念，连同希腊正教及君主专制一起，乃是俄罗斯国定的思想体系之主要原则。然而，为了使我们明白俄国浪漫主义的起源，我们有简略地讲一讲欧洲文学发展史之必要——因为，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浪漫主义也是从外国输入的产品，而且一切确立‘人民性’这观念的前提，也是西欧传给我们的。”18世纪，在俄罗斯翻译出版的外国散文中，法语的作品最多。当时，作为俄罗斯文学主要消费者的上流阶层把法语当作必须的教养，法语成为他们社交的主要用语。在俄语无法准确表达的场合，即便是日常生活也使用法语。这样，法国启蒙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俄罗斯。在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等倡导的普世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观盛极一时。这些法国启蒙作品通过翻译或原文渗透到俄国，孟德斯鸠的适应环境的民族多样性，伏尔泰的文化与理性的发展史等给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以重要影响。普希金曾在1825年的文章中写道：“从某个时候起，讲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文学作品中缺乏人民性，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习惯，——但从没有一个人想来下一个定义，他究竟是怎样理解人民性这个名词的。”高尔基也曾指出：“斯拉夫派最老的和最初的奠基者，都生于19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官方的“人民性”学说开始形成的时代。……他们都到过外国，长久在外国居留，有些还在德国大学里念过书，他们都承袭了德国的浪漫主义，而这种浪漫主义，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是跟‘人民性’学说相符合的，‘人民性’一说过是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罢了。”可见，在19世纪初的俄罗斯，关于“人民性”这个概念的讨论是受到了西欧的影响，并几乎和西欧是同步的。

在西欧，“人民性”或“民族性”的词源，即英语“nationality”（法语 nationalité 德语 Nationalität）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十七世纪末期（1691），19世纪初它才在西方获得比较普遍地使用。因而，在19世纪之前，这种思想或观念的载体多是用“national character”这个词组来表现的，而19世纪初的英语词典中“nationality”与“national character”具有互释的关系。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论证了民族精神（l'esprit de la nation）或民族性（caractère de la nation）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其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从用词上来看，孟德斯鸠所用的“caractère de la nation”相当于英语“the character of nation”，它还是一个较长的词组。而到了卢梭写作《科西嘉宪法草案》（1765）的时候，这

个概念愈加成熟，他直接使用了更为精炼的语言形式“*caractère national*”（相当于英语 *national character*）。

在英语中，“*national character*”较早见于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逊（George Anson 1697-1762）《安逊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740-1744*）。休谟在其1742年的《*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中的《*OF NATIONAL CHARACTERS*》这篇文章中，8次使用了 *national character* 这个词组。在德语中，“*Nationalcharakter*”相当于英语“*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ität*”相当于英语“*nationality*”。赫尔德在其《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中虽多处使用了德语 *Nationalcharakter* 这个词汇，却没有德语 *Nationalität* 的用例。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832*）中，则同时使用了 *Nationalcharakter* 和 *Nationalität* 两个词汇。

尽管“*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ity*”（国民性、民族性、人民性）是一个近代概念，它的语义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关于“人民性”的思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国风”这个概念，描述各地方风土人情的诗歌不胜枚举。吉野耕作曾指出，在世界历史中，民族性的思想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公元3世纪东汉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公元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就有民族性格的诸多描述。吉野耕作甚至认为，对北欧人、亚洲人、希腊人进行对比，以此论证希腊人优越性的民族性比较研究，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

顾尔希坦指出：“‘人民性’这个概念本身，在文学中出现还是比较不久的事；它的根源应该在文艺复兴的时期中寻觅出来，因为这时候，欧洲各国民族文学发展的问题，正被特别尖锐地提出来。在十八世纪时，人民的创造，其本身已成为当时的以及最后造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伟大社会变革的一个后果，因此随着当时对于人民的创造的兴趣的增长，‘人民’和‘人民的’这些字眼，在文学的论著中就开始更加被确定了。”文艺复兴之后，随着中世纪神学论的解体，近代自然理念逐渐形成，界定人的神性基础被近代自然理念所置换，从“人”的自觉再到“群”的自觉，由种族、地域、语言、风俗、宗教等构成的民族性（民族特性）成为西方近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卢梭在《科西嘉宪法草案》（*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中写道：“*La première règle que nous avons à suivre est le caractère national. Tout peuple a ou doit avoir un caractère national et s’il en manquait il faudrait commencer par le lui donner.*（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应该有民族特性；如果他们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须先着手赋给他们以民族特性。）”尤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对民族性的关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1）强调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涵养一种精神的民族性原则，强调德意志民族的血统、语言、风俗尤其是精神传统的独特性，表现出对民族国家中央集权的整合性渴望；（2）强调民族性（民族精神）在动员和整合民族力量过程中的作用，宣扬民族性是组成民族的每个个体的个性的有机融合。（3）通过德国浪漫主义，民族性（*Nationalität*）获得了整合民族力量的民族精神内涵，并成为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族摆脱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民族动员、实现民族认同的民

族国家官方意识形态。

总之，“人民性”（nationality）这个概念来自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启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序幕，“三十年战争”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里程碑，18世纪英、法旷日持久的战争加速了两国近代民族国家制度建构和民族意识形成的进程，18、19世纪关于各民族起源、历史、现状、发展的民族主义论题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形成了为民族国家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而“人民性”（nationality）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为了关键词。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官方理论，“人民性”思想理论是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总是以全民族的代言人自居，因而引起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马克思曾在1842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由出版物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来说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出版物，成为 haute volée（上流社会）的出版物，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篇文章原文是德文，其中的“人民性”即对应于德语 volkstümliche Charakter 这个词组。德语 volkstümliche Charakter 与 volkstümlichkeit、Volkstum、Nationalcharakter 及 Nationalität 这几个词具有同义关系，并对应于英语 national character 或 nationality，且这几个词又都可以翻译为“民族性”“国民性”“大众性”等意思。马克思在这里明显地将人民精神，即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与诸侯等级（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进行了切分，反对他们以民族代言人自居的“人民性”观点。正因为如此，高尔基称沙俄政府的“人民性”思想是官方的“人民性”。瞿秋白则称之为“政府的民族性论”。

三、日语中的“人民性”概念

在日语中^⑧，目前所见“人民性”一词的最早用例出现在幸田露伴的文章中。1932年，幸田露伴在《满蒙问题研究资料》（第十二辑）上发表《支那の人民性》一文，其中写道：“支那の人民は平和の尊重者であり、野望を抱くものの犠牲となる如き事を好むやうな馬鹿げた人民ではない。常に聡明であり、また實際的であり、勤勉的であり、寧ろ冷淡かと思はれる程非熱狂的であって、決して西洋諸国の人民の如く剽悍なことを喜び、冒険的なことを喜び、侵略のことを喜び、圧倒的のことを喜び、さういふ人ではない。”这里不难看出，幸田露伴所说的中国人的“人民性”概念，在语境及语义上和之前日本广为议论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概念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他一反之前贬低中国国民性的说辞，列举了中国国民性的诸多优点。幸田露伴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沿革分析认为，中国人天性就是爱好和平的，“支那では二十何代といふ代変わりになって、いつも以上のやうな状態を続け来た即ち前のものは滅び、後のものが興る永い歴史を作って来ている。その間に生存して来た支那の人民はまことに憐むべき

ものといひたい程平和の愛好者である。また大体善良であり勤勉である性質をもって来た。”他还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例，认为其霸业的成功得益于契合了中国的人民性，“太祖は皇覺寺の托鉢の僧から身を起こして、僅かな歳月の間に天下を統一することが出来た。それは太祖が人民の眞の味方、即ち平和を致すことに真心を有していた為に、人民の支持するところとなったからである。何等の地位も、環境もない一匹夫が僅々の歳月の間にかかる大業を遂げることが出来たのは、支那の人民性に合ったやり方をし、またさういふ人物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幸田露伴的这篇文章写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排日倒日”爱国运动是部分中国人受国内野心家、武人的煽动，而非多数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本性，他呼吁日本国内不可误解中国的人民性，“支那の人民性を誤解せず、正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特に日本人は支那の人民の眞の性質を理解してこれに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支那の人民が排日倒日の如き旗印の下に集まったのは、寧ろ野心家の武人等に利用されて、馬鹿げた一時的の感情にあやまれたものと見て間違ひなからう。支那の人民のすべてがああいふものであると解釈するのは、正しい見解ではないであらう。”从这里可以看出，幸田露伴的观点明显带有配合当时日本提出的“日支亲善”政策的用意，而缺乏对其侵略本质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占领下的民主化改革，使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获得了一个宽松的发展机会。在这种背景下，苏俄无产阶级艺术人民性思想在日本得到传播。1949年4月，横山林二在《俳句人》第16号上发表《俳句における人民性》一文，其中写道：“俳句わもつとも大衆の詩であり……だから戦前戦時をつうじて、ブルジョアジーもファシストも、俳句を「武器」にして人民を煽ってきたのである。……戦後、われわれ人民の手によって、正しい民主主義文化運動がすすめられている時、俳句においてわ、とくにその大衆の性格がゆがめられ、ふたたび反動どもの寵児とされる怖れが濃い。すなわち「俳句の危機」に、われわれわぶつ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从这里不难看出，“人民性”概念的语义相较于上文幸田露伴的文章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的艺术人民性思想带有了明显的阶级立场，并在日本文学界发生了关于艺术人民性的争论。“既成俳句の殿堂に火を放ったが、われわれにわ俳句にたいする具体的な建設的な歴史観——俳句の人民性について、モウロー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モウローとゆうことわ日和見主義でもある。日和見主義でいて、どうして伝統えの強力なたたかいや、俳句の人民的確立ができようか。でわ俳句における人民性（大衆詩としての歴史的なかつ芸術的な性格）とわなにか。それわ俳句をあれこれ形式や技術の面でのみいぢくりまわしても、正しい解答わでてこない。前述したような、労働者階級の愛すべき芸術である俳句を、従来のエピゴーネンから解放し、「人民的民族詩」として高めてゆくとう態度、歴史的過程のなかで、それらを取りあげてゆかねばだめである。”横山林二指出，在无产阶级俳句阵营内，为使俳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作家们曾试图做出了再现俳句大众性本来面目的努力。为此就必须追溯俳句的历史。不仅要挖掘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古典的神秘，还要用历史的手术刀解剖俳句这种艺术形式，从中探索出其大众性魅力的根源。1928至1938

年间，针对赤城さかえ与芝子丁种的争论焦点，小田切秀雄的俳句否定论、桑原武夫的俳句第二艺术论、小野十三郎的短歌俳句抒情止扬论等，给日本无产阶级俳句创作以重大启示。

如前所述，关于文学人民性的争论，早在19世纪初叶的苏俄就已经被普希金、别林斯基等所讨论。实际上，在日本明治中后期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争论，只不过在概念使用上，是围绕“国民性”，而非“人民性”展开的。1898年4月，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的倡导者高山林次郎发表《小説革新の時機（非国民の小説を難ず）》一文，对坪内逍遙等提倡的写实主义文学提出批判：“試に聞はむ、過ぐる十年間の写実小説は、果して何れの点に於て国民的性情を解釈し、若しくは是を満足したりとするか。（中略）日本国民は快活楽天の国民なり、然るに写実小説は悲哀厭世の恨事を説く。日本国民は尚武任侠の国民なり、然るに写実小説は涕淚柔懦の事蹟を語る。日本国民は世界の中に於て最も道義的情緒に富める国民なり、然れども写実小説は却て彼等に向て非倫背徳を奨む、日本国民は忠孝義勇を以て人道の大本となす、然るに写実小説は一も君父を言はざるなり、日本国民は家系の繼承を重じ国家の運命を懸念するに於て世界其比を見ず、彼等は君父の為に死するを以て最高の名誉となし、国民の利福は独り国家の昌栄の中に見出し得べきことを確信す、然るに写実小説は却て彼の為に情死を説き、民権を説き、平等を説く。花柳の情恨、市井の屠沽、写実小説是を写して往々其精巧を究む、而かも国民的意識の深底を探りて其性情最後の琴線を打弾せしもの果して幾何ぞ。”这与高尔基所惯称的沙俄时期的“官方人民性”何其相似！高尔基指出，沙俄政府赖社会和文学之助，炮制了官方国家民族主义学说的三大原理：“第一，希腊正教—他们说：我们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它是由拜占庭从希腊人那里侵袭下来的，而在拜占庭基督的教义被保存得最纯粹。第二，君主专制—俄国的沙皇是全民选拔出来的一国之主，而不是像在西欧那样由贵族从自己阶级中选拔出来的贵族代表。沙皇正是所谓阶级以外的或者说超阶级的人物，所以民族的诸阶级的利益在他是一视同仁的。第三，‘人民性’—根据上述两个理由，而且因为俄国人民并没有纵情于西欧的奢侈，没有沾染西欧的谬论，温良而忍耐，没有因形形色色的劳动过程而分化，惟其如此，俄国人民便不是像西欧农民那样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公社社员、集体主义者。”

针对高山林次郎对写实小说的批评，纲岛梁川发表《国民性と文学》一文，对高山林次郎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国民性とは何ぞや、国民的性情の満足とは何ぞや、そもそも又此の要求に是認せらるべき点ありとせば、そは果して如何程の意味にて是認せらるべきかと。漫然国民性を描けといふ、而も其の意義其の根拠を繹ね来たれば頗る漠たるものあり。之れを解して、一、国民性の一部の影を描けとの義とすべきか、二、国民性の全部の影を描けとの義とすべきか、三、国民の美処もしくは美なる特質を描けとの義とすべきか、所謂国民性を描けとの要求にして以上の三解の外に出でずとせば、是等は果して如何なる意義をか有する。”纲岛梁川认为，作家只要是日本国民，即使选取一个世界主义者或者选择一个外国人作为文学题材，也完全不可能摆脱国民性的痕迹；因此，“国民性の一部の影を描けとの義とすべき”这种要求如同毫无意义的废话。再者，国民性本身是颇为模糊、难以捕捉的东西，无法

明确国民性的范围，只是一味要求描写出全面的国民性来，这也是不合适的。他更加不同意小说必须只描写国民的美好品质的观点，坚持认为丑行短处也是国民性的一部分；描写国民性的优点能促进国民性格的完善，而描写国民性的缺点就无法促进其完善，这是无法解释通的。

对于高山林次郎的国家主义国民性思想，幸德秋水的好友齐藤绿雨也是采取了抵制的态度。1897年5月，高山林次郎在《太阳》第三卷第十三号上发表《日本主義を賛す》一文，其中写道：“日本主義とは何ぞや。国民の特性に本ける自主独立の精神に拠りて建国当初の抱負を發揮せむことを目的とする所の道德原理、即是なり。”对此，齐藤绿雨在《万朝报》上发表《論理と便利》一文，他不无讽刺地写道：“下戸だから菓子を売る、上戸だから酒を売る、日本だから日本主義に限ると云ったやうな、至極尤も御時世がアマ来たと思ひたまへ。(略)唯もうワツツといふ騒ぎで、其騒ぎを国民の元氣、精神、本領などと言ったものだ。”相对于高山林次郎所描绘的“我が国民は公明快活の人民成り。有為進取の人民なり、退嬰保守と憂鬱悲哀は、この性に非ざるなり”这种壮美的国民形象，绿雨所描绘的日本人则是暗含悲惨情绪的卑小、杂多、滑稽的国民形象，简直是对高山林次郎“大日本人”国民形象的嘲笑。尽管高山林次郎在文中没有使用“国民性”“人民性”这两个概念，但他在文章反复使用的“国民の性情”“国性”等词是和“国民性”同义的，而且他在同时期的文章里也有使用过“国民性”，是较早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学者之一。

其实，上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在翻译苏俄文学理论时所使用的“人民性”“民族性”概念，山内封介在其1926年《ロシア革命運動史II小ブルジョア智識階級の革命運動時代》一书中，用的则是“国民性”这个译词，其中写道：“ニコライ一世政府の文部大臣ウワーロフが、国民教育の基礎の標語として主張した『正教と専制と国民性とを擁護せよ。』という言葉が、スラヴ主義の標語であったことは、想像に難しくない。で、スラヴ主義の使命は、ロシア在来の国家制度と教会制度と社会制度との根底を説明し、擁護するにあ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又スラヴ主義によると、国民性という言葉の定義は、ロシアにおける主要勢力なるロシア人の有する各種の特長を総合したもので、『国家の諸制度は、此の国民性から発生するものである。スラヴ主義は、全スラヴ人の間に、国民精神の特長を求めらるもので、ピョートル大帝の作った新制度は、国民性を滅却するものである。』と解釈していた。従って、スラヴィ主義者も、亦政府から猜疑の目を向けられたばかりか、迫害さえ加えられ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日语中的“人民性”一词较汉语出现得早，但它在很长时期内语义上和“国民性”并没有区分。日语中的“人民性”和“国民性”语义发生分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民性”较之超阶级的“国民性”，语义里明显带有了阶级立场。通过日本国会图书馆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标题中含有“人民性”主题词的文献集中出现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不长时期，且多是有关苏俄文学方面的文献，如：《ソヴェト文学史. 第1》(除村吉太郎編，岩波書店，1951)中的《社會性、ヒューマニズム、民族性と人民性，人民性と黨派性》、《文芸講座. 第3卷》(青木書店，1953)中的《人民性》、《文学理

論·第1》(チモフェーエフ著, 青木書店, 1954)中的《人民性》、《スターリン言語学と文学芸術論》(山田広行訳編未来社, 1955)中的《文学の人民性の問題》、《講座歴史·第4巻》(国民の歴史意識変革の運動, 江口朴郎等編, 大月書店, 1956)中的《民衆のこころの歴史—人民性・楽天性・空想性について》、《ソヴェト時報·(226)》(ソヴェトプレス通信社, 1958-09)中的《要求される人民性》以及《現代の批評》(浜田泰三著, 三一書房, 1959)中的《美と時代—人民性の神話》等。其中,《文芸講座·第3巻》中的《人民性》一文,还用片假名“ナロードノスチ”注明了它的词源,即上文提到的俄语“Narodnosti”。现在,“人民性”这个词在日语媒体里已经看不到它的存在,日语各种辞书里也几乎看不到这个词条。

结语

“人民性”和“国民性”“民族性”是同源词,即源自近代西方“nationality”这个概念。在“nationality”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传播到中国过程中,日本和苏俄先后成为概念传播的中转站,并在译词语义上留下了各自深深的烙印。清末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借用的“国民性”一词变成了“中国劣根性”的代名词,与日本明治以来步西方后尘大肆批判中国国民性的话语渊源颇深,并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而苏俄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nationality”这个概念则又经苏俄这个新的渠道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解读,并翻译出了“人民性”这个现代汉语新概念。毋庸讳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是在“国民性”“民族性”这两个日语借词的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从而赋予了它相对于贵族阶级、统治阶级的更多的群众性、大众性内涵。时过境迁,随着冷战的结束,在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淡化的全球背景下,在当下中国语境中,除却历史的烙印,“人民性”与“国民性”在语义实质上已无甚差别。爱国,即民族国家认同是近代“国民性(nationality)”思想的核心,民族文化认同、民主政治认同和社会公德认同是近代国民性思想的三个支柱。所谓“文艺作品中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的反映”,即是文艺服务于政治,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大众反对经济压迫、政治专制的革命思想。近代以来,建立人民大众做主的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最炽热的情感,最光荣的梦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近代国民性思想的全部要素。只不过,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性话语的政治逻辑是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造人民大众,以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任务,因而国民政府的脱离群众注定了其政治理想的破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性话语的政治逻辑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工农革命实践来锻炼人民意志,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并最终完成民族国家建设。国民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不同归宿,反映了近代西方概念“nationality”与中国国情、民情契合的特殊模式,其影响重大而且深远。

注释:

- ①检索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6 日。
- ②检索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6 日。
- 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 ④方毅等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 年；商务印书馆编审部编纂，《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57 年；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 年；何九盈等主编，《辞源》，商务印书馆，2018 年；舒新城等编，《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1947 年；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年；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年；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黄河清编著，《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黄河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年。
- ⑤梁启勋 1903 年 3 月在《新民丛报》第 25 号上发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其中即有“国民性”这个词的用例。
- ⑥本文所引日语文献，尽可能保留原文用字原貌，只对个别旧体字因输入不便而改为新体字。

参考文献:

- [1] 尹韵公（2013），《一个经典概念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北京日报》，2013 年 9 月 30 日第 017 版理论周刊·新论；林枫（1990），《评胡绩伟“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新闻战线》第 4 期。
- [2] 胡乔木（1999），《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第 339 页。
- [3] 白胜德（2007），《新闻‘人民性’提法当摒弃》，《新闻导刊》第 4 期。
- [4] 习近平（2013），《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http://www.21cbh.com/2013/8-20/wNNjUxXzc0NjEwNg.html>
- [5] 习近平（2016），《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 [6] 张涌等主编（2011），《现代汉语辞海》（修订版中册），中国古籍出版社，第 923 页。
- [7] 阮智富等主编（2009），《现代汉语大词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270 页。
- [8] 中华大辞林编委会编（2012），《中华大辞林》，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1782 页。
- [9] 尹韵公、丰纯高（2006），《关于新闻理论中的“人民性”问题》，《红旗文稿》，第 18 期。
- [10]（苏）B. 雷赫著，苏凡译（1941），《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之诸问题》，《中苏文化》（文艺特刊），第 153 页。
- [11] 魏辛译（1941），《红色处女地月刊》，《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之真相一论〈文艺批评家〉杂志的有害观点一》，《中苏文化》（文艺特刊），第 156, 160 页。
- [12]（苏）顾尔希坦著，戈宝权译（1947），《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海洋书屋，第 6, 13, 4-5, 7 页。
- [13] 张健主编，李怡本卷主编（2012），《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 1 卷 1949. 07-1953. 12），山东文艺出版社，第 229 页。
- [14]（苏）J. 阿尔脱曼著，魏辛、孟达等合译（1940），《蘇聯的新社會與新文藝：蘇聯社會主義的文學及其最近的文藝論爭》，《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 23 周年纪念特刊），第 205, 208 页。
- [15] 胡风（2019），《胡风集》（二），湖北人民出版社，第 491, 2 页。
- [16] 胡风（1939），《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七月》月刊 4 集第 1

- 期，第6页。
- [17] 胡风（1939），《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改进》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第384页。
- [18] 胡风（1945），《七月新丛·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重庆：南天出版社，第66页；胡风（1946），《七月新丛·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上海希望社，第55页。
- [19] 胡风（1953），《剑·文艺·人民》，上海泥土社，第106页。
- [20] 李冬松（2019），《清末、日本を経て受容された「nationality」について》，《語学教育研究論叢》第36号。
- [21]（苏）高尔基著，缪朗山译（2011），《俄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2, 133-135, 50, 54, 116, 133-134页。
- [22] 后藤正宪（1998），《普希金プーシキンの民族性理解について：十九世紀初頭ロシアのロマン主義文学を背景に》，大阪大学《年报人间科学》19，第249-263页。
- [23] Simpson, J. A（1989），*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32-234.
- [24] Samuel Johnson（1827），John Walke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illiam Pickering, p.486.
- [25] Montesquieu（1777），*The Spirit of Laws*, 4 vols. Vol. The Complete Works of M. de Montesquieu, London: T. Evans, p.432.
- [26] Rousseau（1765），*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 June 2013,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Rousseau_jj/projet_corse/projet_corse.pdf
- [27] George Anson（1748），*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John and Paul Knapton, p.204.
- [28] David Hume（1793），*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Vol.I, T. Cadell, London, p.198.
- [29]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871），*Heinrich Kurz,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Bibliographischen Instituts, pp.167, 367, 385.
- [30]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duard Gans, Karl Hegel（184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uncker und Humblot, pp.21, 545.
- [31] 吉野耕作（1997），《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現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行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第82, 98页。
- [32]（法）卢梭著，何兆武译（1980），《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第62页。
- [33] 汪卫东、张鑫（2003），《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性概念——答竹潜民先生兼与刘禾女士商榷》，《鲁迅研究月刊》第1期，第66页。
- [34] 徐迅（1998），《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22页。
- [35] 马克思、恩格斯（19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49页。
- [36] Marx（1842），*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Rhine Province Assembly. First Article. 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ssembly of the Estates*, Marx-Engels Archive, Volume 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cw/index.htm>
- [37] 广州外国语学院《简明德汉词典》组编（1979），《简明德汉词典》，商务印书馆、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03, 1056页。
- [38] 瞿秋白（2004），《俄国文学史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6页。
- [39] 幸田露伴（1932），《支那の人民性》，《满蒙问题研究》（第十二辑），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第80, 84-85页。

- [40] 横山林二（1949），《俳句における人民性》，《俳句人》第16号，新俳句人联盟，第10页。
- [41] 高山林次郎（1912），《小説革新の時機（非国民的小説を難ず）》，《时代管见》1898年3月，《栲牛全集》（第2卷文艺评论），博文馆，第555-556页。
- [42] 纲岛荣一郎（纲岛良川）（1905），《国民性と文学》，《早稻田文学》，第七年第八号，1898年5月，《良川文集》，日高有隣堂，第758页。
- [43] 高山林次郎（1913），《日本主義を賛す》，《太阳》第3卷第13号，1897年5月，《栲牛全集》（第4卷时势及思索），博文馆，第257, 266页。
- [44] 齐藤绿雨（1994），《論理と便利》，原载《万朝报》1898年5月6日，《齐藤绿雨全集》（卷二），筑摩书房，第248页。
- [45] 塚本章子（2004），《日清戦争後の緑雨——国家主義化への抵抗》，广岛大学近代文学研究会，《近代文学试论》第42号，第20页。
- [46] 李冬木（2008），《“国民性”一词在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92号。
- [47] 山内封介（1926），《ロシア革命運動史II小ブルジョア智識階級の革命運動時代》，金星堂，第136-137页。
- [48] 青木文库（1953），《文艺讲座》（第3卷），青木书店，第184页。

謝辞：本稿の執筆にあたり、神戸学院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の胡士雲教授から資料収集等多大なご支援をいただき、ここに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ます。

プロフィール：李冬木，厦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課程修了、大東文化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客員研究員、神戸学院大学日本学術振興会研究員、暨南大学外国語学院准教授。